

從目錄學的起源論其實用特性 View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Bibliography from Its Origins

盧 荷 生

Ho-sheng Lu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目錄之學，成為專門學術，由來已遠，但能歷久彌新，為世人所重，必因其為用，功能顯著。惟前人之於目錄學，多自學術研究之觀點，論其類例之嬗變，與體例之更異，著述甚豐。至所以為用，鮮有論及。本文自目錄學的起源論其功用，其乃為知識資訊與需求者間之橋樑，藉知識之推廣，資訊之傳播，嘉惠世人，目錄之「實用特性」可以完全實現，發展之命脈亦可以常存矣！

Bibliography has developed into a professional field of academics thanks to its notable functionality in appli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ound this functionality by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plays the role as a bridge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its acquirers. The prominent functionality of bibliography could be carried out to its fullest extent and furthermore continue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prevailing of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關鍵詞 Keyword

目錄學

Bibliography

本文原為5年前籌編慶祝喬衍琯教授七十晉五華誕論文集所作，後未完成出版。不幸喬教授於97年2月17日逝世，喬教授與我同鄉、同學、同事，相交逾半世紀，謹以此文悼念其一生研究目錄學之成就，並慰其在天之靈！

目錄之學，成為專門學術，由來已遠，但能歷久彌新，為世人所重，必因其為用，功能顯著。惟前人之於目錄學，多自學術研究之觀點，論其類例之嬗變，與體例之更異，著述甚豐。至所以為用，則視為當然，鮮有論及。是有關目錄學之功用，與其所具之實用特性，且為目錄學發展之命脈，如能為文縷述，或有可觀。

目錄之起源，蓋在國家之典制既成，文獻乃興，著述日增，必定有所收藏。所藏既豐，目錄於是形成，初縱無目錄之名，而實已存在，應無可疑。但論者咸以漢劉向校書為目錄之始。「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註1)蓋劉向承朝令校書，是政府從事圖書典籍之蒐集整理，意義自然不同。雖史籍先前已有校書之紀錄，但皆不若此次規模之大，受重視之多。且奉朝令校書，工作完成，自須對政府有所呈報。但每一圖書，自成體系，故每校書一部，則各自為錄，隨附本書，以便上奏。至每書一錄，皆撮要敘述，故又稱敘錄，方便御覽。是劉向所著目錄，其原始功能固十分清楚，有如工作報告，為其作業所需，全在應用。故目錄初起之時，已充份顯示其應用之特性，雖千萬世之後，目錄之此一特性，亦無法須臾或離。後代從事目錄學研究，為專門學術，而此一特性，亦無以改變。至劉向等所著敘錄，垂為爾後萬世之典範，貢獻自多。

復以當時所著敘錄之內容以觀，學術性固高，但其應用特性亦甚明。因《別錄》今已佚亡，難窺全貌，但自殘簡佚文所見，亦可知其內容常包括：書名與篇目，顯示一書之內容；讎校原委，敘述校勘之經過；著者生平，介紹著者之背景；書之真偽，陳述考訂之結果；內容評論，評述一書之內容；學

術源流及其價值，則為對該書歷史淵源之追溯與學術價值之評定，可謂應有盡有，十分完備。如此敘錄，讀者一經批覽，對每書之精髓，自己瞭然於胸。然敘錄之作，實非等閑可得，必深爛各書之內容，熟習著者之背景，洞悉各書之源流，而後可以評論其得失，故劉氏校書所作敘錄，其學術價值，備受肯定。拙文「論中國目錄學的學術特性」(盧荷生，民75a)中曾詳細論及。但其最值得重視者，在敘錄之內容詳盡如此，其貢獻厥在藉敘錄可以使讀者完全瞭然一書之梗概，有助於閱讀至大，目錄之功能，得以充份發揮。故其成就雖在學術，而功能卻在應用。

及劉向卒，子歆繼父業，校書既多，眾籍叢立，必思如何排比，以定其順序，方便於管理，亦利於尋檢利用。否則，收藏既多，倘雜亂無序，亦難以為用。「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註2)劉歆為何要「總」？如何「總」？殆劉歆須將所校之書，統合上奏，勢必加以梳理，分別門類，方便御覽。是劉歆乃從事圖書分類，而定為七略，此亦因工作需要，其設想全為應用。後代目錄學者，以分類學之原則，推斷其思維，討論其得失，其實當初恐未必如此。蓋父子兩代，相繼校書，「種別為七略」(註3)，乃工作之總結，而七略竟成為圖書目錄分類之始，當初或未料及。至劉歆將群書如何種別為七略？今文獻難徵，但以七略之類目以觀，可知其乃依當時學術發展之情勢而定。何以言之，蓋當時之著述，如《七錄》所收，而圖書分類，係將所有之典籍，同其所同，異其所異，分門別類以成。漢處春秋戰國之後，儒家思想已定於一尊，故七略先六藝，次諸子，再詩

賦，後及兵書、術數與方技，明顯受儒家觀念之影響，亦事屬當然。儒家思想橫亙我國數千年，如此圖書分類亦流行久遠，其間雖有六分與四分之不同，但類目邏輯推衍，並無二致。是劉歆七略之分類，最初純為總群書而為，悉從當時學術之觀念而定，更全為方便上奏供御覽而作，然而影響之所及，至今仍多跡象可尋。如目前台灣各圖書館普遍採用之《中國圖書分類法》中，仍主張將十三經之單行本歸入(089)「群經」類號，即為明顯例證。綜合以上所述，可見劉歆七略之於我國圖書分類史，其影響可謂至為深遠，亦可知目錄學初起之時，其功能之應用特性，十分清楚。

魏晉之時，學術發展之新情勢出現，目錄之類例隨之變易。其中以魏鄭默《中經》，晉荀勖《新簿》，首開風氣，最為明顯。「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註 4)《七略》《漢志》以降，目錄已有定制，而今有所更易，應出於對新情勢之因應。最為明顯者，為史籍之激增。蓋兩漢之世，已有史書，但「書」與《春秋》均列為「經」，其餘史書，若自成一類，數量顯難與其他諸略相比，故皆附《春秋》之後。迨史籍既繁，附庸大國，已成事實，如不改弦更張，於理未合，況史書附於經籍之末，本權宜之計，故四部之興，乃情勢使然。目錄類例之變易，應非出於鄭、荀個人之巧思，實純為因應事實之需要，十分明顯。或以學術發展，愈為專精，圖書分類，應由簡入繁，何以反由七略而入四部，其實四部之下，複分愈細，是分類更見精細矣。「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

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註 5)依據以上所述，可知當時列入史部之圖書，數量既夥，內容亦豐。綜觀四部之中，除丙部史書，為新增類目之外，其餘甲部承六藝略之舊，丁部為原詩賦略，乙部為諸子略及其他各略之總和。蓋兩漢以來，儒術獨尊，其他諸子，甚至兵家、術數、方技已大不如春秋戰國之時，著述相對減少，性質亦有相近，故合而為一。另相傳鄭、荀四部之外，已有「佛簿」(註 6)，衡諸當時記載，佛教入傳，譯經頗多，君主禮佛，佛經入藏內閣，典校編目，有佛經一簿，亦屬理之當然。然則四部之外，復有佛部，已成五類，是亦目錄必須面之對實際情況，富有實用特性之又一明證。《中經》《新簿》以後，有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眾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註 7)至此自四分法目錄以觀，有兩點值得重視。一其雖為四分，但經、子、史、集順序已變為經、史、子、集，二其類目標記由內容主題文字改為天干。前人論目錄之演變，對子書與史書次序之對調，著墨不多。其實，此中多有值得討論之處。「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註 8)此雖為清修四庫時所作言論，但已足見在國人心目之中，能與「經」相配者惟「史」，其受重視之程度，不言可喻。《晉元帝四部書目》將《中經》、《新簿》之「乙」、「丙」兩部互換，自係受當時學術觀念之影響而為之。近代西洋目錄學入傳，以圖書分類，應依學術發展系統排比，而不應受價值判斷之影響。惟我國傳統目錄之學，自始以來，以「經」為首，即係以儒家之觀念為權衡之依據。故互換「子」、「史」兩部圖書之順序，應非無所為而作。此中意義無他，「史」部圖書，可以「資治」，可以為「鑑」，其功用雖難與「經」相比，但其目的則別無二致，明顯較「子」為重，故互換其在目錄中之位置。圖書分類，在目

錄中之位置，展現當時對典籍之學術價值判斷，是又為應用特性之例證。至以「天干」標記，與目前多數分類法相同，如《中國圖書分類法》仿《杜威十進分類法》以數字標記，《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以英文字母與數字混合標記，皆與我國傳統目錄學習用文字顯示內容以為類目標記不同。以今日之觀念以論，固各有長短。文字為標記以顯示各類之內容，目錄之結構與類目之內涵一望而知，使用者自然方便。惟作為標記之文字，其涵義必須與各類內容密切相符，否則易生誤會，徒增困擾。但冀望維持此一要求，實非易事。我國過去目錄，如「六藝」、「諸子」、「詩賦」等及「經」、「史」、「子」、「集」諸類名，爭論極少。再加細分，類名之間，屢有變易，甚至多所論辯，足見類名之擇定，雖僅求穩妥，亦屬不易。復以小序之作，闡明各類之內涵，敘述其源流，以別於他類，既為目錄學創添體例，又富有學術價值，更為後人所稱道，亦證明類名之間，寓意實深。至以天干為標記，及今日以數字或英文字母為標記，自可以免除訂立類名之困難，且條理清楚，涇渭分明，類目層次，排比井然。惟使用目錄之人，必先熟記每一類目之標記，方便於查用，殊深困擾。況現今圖書館所用分類法每不一致，尤為讀者所苦。為解決此一困難，圖書館特編製「標題目錄」，供眾查用。標題目錄，乃以標題顯示內容，以文字作為標記，再如當今習慣以關鍵詞檢索網路資源，又回歸與我國古代目錄相同，此中饒富意義，頗堪回味。但無論如何，《中經》、《新簿》與《晉元帝四部書目》當初以「甲」、「乙」、「丙」、「丁」為標記，或未如今日之思考比較，惟能在千百年之前，為目錄編製添此新例，貢獻之大，實在令人由衷敬佩！然自演變之過程以觀之，目錄學之發展，一切皆以能充份發揮功能為依歸，無一非因實用特性所以致之。

魏晉以降，歷南北朝而隋，七分法以後，而至於唐，所作《隋書經籍志》為我國目錄學之發展，

奠定一尊且長久不變之基礎。至《四庫全書總目》，集我國目錄學之大成，類例週密，體例完整，輝煌巨構，空前絕後。分類系統，沿用至今；體例齊全，無與倫比，為後世範例。直至晚清末年，西學入傳，一時之間，學科驟多，四部自然無法容納。於是圖書分類，必須另作安排；但傳統典籍，仍多採四部分法。新法之中，多仿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以數字作標記，採十進層累制度，依學科發展系統鋪展而成。然學術發展，無法如數字般盡皆為十進，故以之作為圖書分類之架構，必然有遷就勉強之處。但十分法條理分明，層次確定，館員處理，讀者檢索，均極便利，故應用甚廣，普遍受到歡迎。

時至今日，出版品類型多出，除圖書以外，各種視聽媒體，紛紛出現。科技發展，網路資源，應運而生，不僅內容豐富，且出版至為方便，加之傳播快速，無遠弗屆。吾人獨坐斗室之中，可以利用舉世資源，遍覽天下文獻，其樂何如！至於知識發展迅速，學科繁衍多元，深度愈益專精，廣度遍及各種層面，增加之急劇，令人難以置信。反觀今日社會，生活素質提升，生存環境複雜，謀生技能不易，彼此競爭激烈，故大眾求知之欲望增加，資訊之需求迫切。但面對知識之浩瀚，與資訊之劇增，如臨汪洋大海，無邊無際，一時之間，真不知從何入手，縱偶有線索，但能一舉而得，不必反復查詢，即可以獲取真正適切之資料者，真乃少之又少，難上加難。為今之計，解決之道，其惟目錄乎？蓋目錄之為用，本在以簡御繁，所謂「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其此之謂歟！如能善用目錄之功用，將所有各類資源均能盡收於一錄之中，藉目錄之架構，為檢索獲取之途徑，以著錄之內容，為選擇利用之依據。拙文「編目之任務在傳達『資源』之訊息」（盧荷生，民 75b）曾經詳細論及目錄之功能。惟目錄如何方能面對如此艱巨之任務，無他，自必須深入瞭解當前出版製作之情況，且確實把握大眾「資訊尋求行為」之特徵，即所以認知「實用特性」，

乃目錄學之所由起與發展之命脈也。當前圖書館加強「利用教育」，耗費不少資源，是皆由於館藏之整理，目錄之編製，與一般人之認知與習慣相去甚遠，實用特性未能實現。

綜合以言之，現今之最大困難，在記錄知識與資訊所使用之媒體，類型多元，如何彙總而聚集於同一目錄之中，俾使用者僅一次檢索，可以盡知所需資料之所在，而無待乎反覆尋檢，仍有遺漏之虞。至當今學科知識之發展，各有專精，但又常相互支援，進行統合，資料必須交叉應用，如何使凡

有需求者，相關資料，盡皆唾手可得，如此則目錄之為用可謂大矣！目錄學之研究與發展，以實際功用為惟一思考，充當知識資訊與需求者間之橋樑，俾知識與資訊均能為大眾有效利用，發揮功能，造福人群；而凡有知識與資訊之需求者又皆能獲得滿足，藉知識之推廣，資訊之傳播，嘉惠世人，目錄之實用特性可以完全實現，功能發揮之空間仍大，發展之命脈亦可以常存矣！

(收稿日期：2008 年 3 月 1 日)

註釋：

註 1：漢志序

註 2：漢志序

註 3：漢書卷三十六劉歆傳

註 4：七錄序

註 5：隋書經籍志序

註 6：見廣弘明集卷三引古今書最

註 7：七錄序

註 8：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正史類小序

參考書目

盧荷生 (民 75a)。論中國目錄學的學術特性。在輔仁大學編，*慶祝羅總主教晉牧廿五年晉鐸五十年雙慶論文集*(頁 461-478)。台北：編者。

盧荷生 (民 75b)。編目之任務在傳達「資源」之訊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研討會論文集*(頁 13-15)。台北：編者。